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敦煌学专号

「敦煌文学」丛说 周绍良 程毅中

敦煌艺术概观

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

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

敦煌遗书中的标点符号

白化文

段文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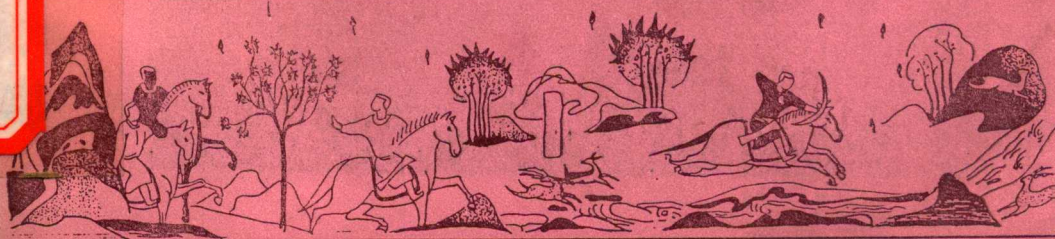
阴法鲁

马世长

李正宇

8

1988





医药学院610 2 01472186

文史知识

1988 年第 8 期

(总 第 86 期)

敦 煌 学 专 号

《文史知识》编辑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敦煌研究院 合办

• 笔谈 •

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季羨林	3
敦煌学回归故里	段文杰	5
敦煌壁画的保护	樊锦诗	6
加强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刍议	〔日本〕池田 温	8
我与敦煌变文研究	〔美国〕梅维恒	9

• 文学史百题 • “敦煌文学”丛说

“敦煌文学”的内涵	周绍良	11
俗赋、词文、通俗小说	程毅中	14
变文与俗讲	白化文	18

• 历史百题 •

敦煌的兴衰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荣新江	23
------------------	-----	----

石窟艺术	敦煌艺术概观	段文杰	30
	敦煌佛教艺术的再认识	史苇湘	35
	敦煌壁画的世俗性	李永宁	39
	敦煌壁画中的佛教故事画	谢生保	43

• 古代科技漫话 (15) •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邓文宽	48
------------	-----	----

文化知识	敦煌石窟中的音乐资料	阴法鲁	54
	古敦煌民间建筑风俗	高国藩	59
	唐代的书仪	赵和平	63

敦煌壁画中的乐器	郑汝中	68
----------	-----	----

诗 文 欣 赏	借得山川灵奇处 聊申短咏讽美名 ——《敦煌甘咏》两首浅析	颜廷亮	69
	对美的童心之爱——敦煌曲子词《菩萨蛮》赏析	刘瑞明	72
	• 学者追忆 • 王重民与敦煌遗书研究工作	刘脩业	74
人 物	统一河西的功臣——张议潮	谭蝉雪	77
春 秋	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	孙修身	81
	• 宗教与人生 • 飞天在人间	段文杰	85
	王梵志和他的五言通俗诗	张锡厚	90
	• 文史信箱 • 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	马世长	93
语 言	敦煌遗书中的标点符号	李正宇	98
知 识	“轳轳”说	饶宗颐	101
	• 文史书目答问 • 敦煌学刊物举要	卢秀文	102
	敦煌的童蒙读物	汪泛舟	104
	• 敦煌学在国外 • 日本“敦煌学”研究简介	荣 昱	108
	法国近年来的敦煌学研究	耿 昇	113
	• 青年园地 • 敦煌北朝的故事画艺术	赵声良	118
文	敦煌石窟	泳 汀	122
史	三危山与西王母	郑 雨	123
古	玉门关与阳关	罗华庆	126
迹	鸣沙山与月牙泉	肖 洛	127
	• 补白 7 则 • 敦煌遗书知多少(10) 敦煌遗书中的袄教资料(47) 敦煌《方角书》(47) 敦煌地区寺院的数量(67) 刘 义狄酿酒(80) 僧鎗(84) 国内外著名佛教石窟有 哪些(112)		
封面图	关晋文 莫高窟 榆林窟(封二)		

笔 谈

- 季羨林 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 段文杰 敦煌学回归故里
- 樊锦诗 敦煌壁画的保护
- 池田温〔日〕 加强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刍议
- 梅维恒〔美〕 我与敦煌变文研究

季羨林

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近几年来，特别是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的几年中，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有关的学会成立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出版了；研究队伍扩大了；许多有外国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召开了；同外国同行们的联系加强了；全世界的信息比较畅通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同我国台湾同行们的接触越来越多了。这一切都像和煦的春风，吹进了每一个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人的心中，吹高了我们的信心。

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一种同我们的研究有密切关联的倾向或者潮流，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西方对东方思想和文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和文化的看法又有了一些改变。

我们天天讲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又偏偏容易忘记这一点。就拿中国文化来说吧，欧美的许多学者颇有瞧不起的意思。我们自己，特别是一些青年，也有这种倾向。这些人大概认为，历来如此，用不着奇怪。可是稍稍懂得点世界历史的人都知

道，17、18世纪，甚至到了19世纪的前半叶，欧洲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中国文化评价之高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只需读一读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便一清二楚。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美有时候连我们也觉得过了头。那时候中国文化在欧洲是金光闪闪的，就像现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一样。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鸦片战争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这些弱点不能负责，至少不能完全负责。然而，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心目中，中国文化不行了。这种偏见和错误的看法逐渐扩散到老百姓身上。从此，中国的身价在欧洲人民心中一落千丈。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完全忘记了中国的形像原来在他们的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子的。更可叹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认为自己一向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把历史统统忘记了。

正在欧洲人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时候，爆发了人类空前的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死伤了上百万上千万的人，破坏了许多城市。战后，痛

定思痛，欧洲人中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出现了《西方的覆灭》一类的书，风靡一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有了危机，救危之方是向东方学习。当时在欧美，研究东方文明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专以中国文化而论，老子和庄子成了热门研究对象。

热闹了一阵之后，天之骄子们故态复萌，对东方文明的兴趣又降低了。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法西斯开始抬头，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了政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场大战波及的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更激烈，更野蛮，更惨酷，死伤的人数更多，受的损失更大。大战结束以后，有识之士头脑又一度清醒，再次进行了反思。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明有严重的缺点，决非尽善尽美，救危之方仍然同上次一样，转向东方。不这样也是不行的。迄今人类文明不外东西两方，非此即彼，一方出了问题，只有向对方寻求解决办法，寄希望于另一方。一部人类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几年以来，细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西方对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哲学思想研究的兴趣又浓了起来。中国的老子、庄子和《周易》等等，以及印度的佛教哲学又流行起来了。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上碰了壁以后，又转向东方思想，这是很自然的。其极端者不但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人类前途也产生了怀疑。姑不论这种怀疑是否有充分的根据，

但它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种情况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有没有关联呢？有的，而且是密切的关联。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研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以及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所结出的丰硕的果实。这种研究对东西两方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今天西方进行反思而我们主张开放的时候。现在西方有一些国家正在同中国的有关方面洽谈共同研究丝绸之路、共同拍摄电影的问题。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般的协作。但是，深入一层来看，是西方反思的结果，想在反思中给西方文明寻求一条出路，寻求一副灵丹妙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

这样一来，我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学者们的肩膀上无形中就增添了一点负担。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更广阔的眼光来进行工作了。我们必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已经取得的联系。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查国内和国外的资料，这种调查我们过去做过一些，但是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提高认识水平和研究水平，放眼全球，从东西方文化互相帮助、互相补充的角度上来从事工作。我们必须跟得上当前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写文章，出书要更加细致，更加严格。做到了这一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将会大大地提高，这是肯定无疑的。（本文作者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段文杰

敦煌学回归故里

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上一门显学，研究的对象，概括的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是当之无愧的。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郡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帝王将相、贵族妇女、民族关系、使者朝会、商旅往来、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药科技等等，法国人称敦煌壁画为“墙壁上的图书馆”。这也是毫不过分的形象的赞誉。两类宝藏加在一起，真可说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

这些文化遗存都是敦煌本土产生的吗？简单说来，它是本土、中原和西域文化的历史积存。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本土文化如北魏敦煌经生著写的文献而外，主要从两方面接受了佛教文化：佛经佛画，如《贤愚经》，就是凉州和尚在于阗参加佛会，将听来的故事集译缮写而藏于敦煌的；同时也从

东面传来了中原和宋齐梁陈的写经。隋唐时代，主要从长安传来了大量写经、文献、诗词和画稿。到归义军时期，已形成封建割据局面，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系，主要是本土产生的文化，然而也有东来西来的文献。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

过去八十年的敦煌学研究，徘徊在欧亚之间，巴黎、伦敦、东京曾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许多论文。当然，中国学者亦未示弱，在文献被盗运出国，资料不易获得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取得了辉煌成果。

今天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近几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出现了许多敦煌学刊物，如：《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等，并举行了5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87年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意味着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事实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敦煌文化，我们正在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为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国各族学者与各国学者开展的学术交流，互相合作，也促进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本文作者系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

敦煌壁画的保护

驰名世界的敦煌壁画，以它无比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绚丽的艺术，深深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和游人。看过敦煌壁画的人们，无不被它的艺术魅力所倾倒，同时也不免会问：色彩鲜艳灿烂的敦煌壁画千百年来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今后还能保存下去吗？这就是文物保护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诚然，保护科学和“敦煌学”研究的对象、范畴、目的、手段迥然不同，但它与敦煌壁画研究密切相关。可以说，过去没有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就没有现存的敦煌壁画；今天如没有科学保护，壁画也无法长存于世。

敦煌莫高窟的地质构造属酒泉系砾岩，由砾石、沙粒和胶质物混合而成，石质松散，无法雕刻。智慧的古代艺术家运用壁画的艺术手段，创造了灿烂的敦煌艺术。壁画的制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成形的石壁上铺以麦秸泥层，压平晾干，有的在泥层上刷以白粉；（2）在准备好的泥壁上，使用土红颜料起稿；（3）使用墨或颜料勾勒线条定稿；（4）落稿完成后使用颜料着色。经科学手段分析，壁画颜料朱砂、红土、石膏、青金石、石绿、氯铜矿、高岭土、白垩、石膏等大多为天然矿物颜料，大都性质稳定，不易变色。敦煌地处戈壁沙漠，气候干燥，空气新鲜，年降雨量仅35

毫米左右，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许多中型和小型洞窟处于缓慢的自然通风状态，能使壁画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之莫高窟远离城市，交通不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灾难性战争等重大破坏，所以，壁画能较好地保护至今。

敦煌壁画和任何物体一样，都在一定条件下不停地运动和变化。绘制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的45000平方米敦煌壁画，在它存在的600年至1600年长短不等的时间里，一直不断地受到当地气候条件、地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敦煌壁画大致由支撑结构（石壁）、地仗层（泥层）、画面层（颜料）组成。其中任何一层因某种原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整体结构，引起病害。经过调查和研究，敦煌壁画由于本身结构变化和外界条件作用的影响已产生多种病害，主要有：（1）性质活跃的铅丹、铅白颜料在强烈的紫外线幅射作用下，使壁画颜料层不同程度地出现变色、褪色。（2）因石窟布局不合理，崖壁裂隙，重层壁画等原因使壁画地仗层空鼓离开石壁，造成大面积脱落，甚至坠毁。（3）壁画地仗层制作粗糙，某种颜料掺胶量不当，使壁画颜料层龟裂，并起翘成鳞状小片，严重者坠落。（4）通过石壁毛细管作用地面下的水分上

升，使壁画地仗层酥松变质。(5)崖体的横向岸边裂隙和纵向垂直裂隙，导致壁画产生裂缝，严重者可引发壁画大面积脱落。(6)据地震裂度区划提供的资料，敦煌位于甘肃河西地震区6—7度的边缘，历史上曾因发生地震造成洞窟震塌，壁画毁损。(7)烟火熏燎形成的烟埃，使污染的画面层无法辨认。(8)游人的涂写和刻划，使画面层的完整受到破坏。(9)随着游人和旅游车辆的逐年增多，莫高窟废料、废气也在逐渐增多，大气中污染物污染壁画环境，可能导致壁画病害继续发展。

为了保护敦煌壁画这份人类的宝贵财富，二十多年来文物保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科学保护方面主要有：(1)1963—1966年、1984—1985年进行两期工程，对莫高窟有裂隙的崖体进行加固，使95%以上的洞窟得到保护，免于坍塌。(2)采用边沿加固和铆钉加固的方法，对600多平方米大面积脱落的壁画进行了修复；(3)用有机合成材料对1000多平方米龟裂起甲壁画和200多平方米酥碱壁画进行了修复；(4)用碱性溶液对烟熏壁画作了清除烟埃的试验；(5)用科学手段对大气环境质量与壁画保护的关系以及颜料变色现象作了初步研究，同时，在管理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如安装铝合金门、玻璃，限制性开放、防盗等）措施。

上述这些工作对成功地抢救艺术珍品无疑是十分积极与必要的，但现在若是仅止于此，则远远不够。文物

保护工作者们清醒地看到，对壁画病害进行治疗固然必要，但病害根本原因不明，病害根源不加根除，就无法有效地防止其继续发生；保护壁画最重要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迄今为止我们对有关的气象情况和环境质量知之寥寥，如不能及时掌握气象条件和环境质量同壁画病害之间的关系，病害仍然无法有效防治；旅游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给壁画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如不及时调查研究，因势利导，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十分易于损坏的壁画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毁于旅游公害。因此，今后要做的保护工作尽管很多，但最根本的仍是要搞好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敦煌壁画光彩不衰。

长久保存敦煌壁画的重要目的，又是为了使这一艺术珍品更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保护与利用的相互关系应是辩证关系。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材料，要为“敦煌学”和多种学科研究提供资料，要为发扬优秀艺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借鉴，要为开展旅游开放、国际文化交流提供资源，就必须要对这一易于损坏的稀世珍宝备加保护。否则，一旦失去了壁画这一物质前提，发挥作用就是一句空话。从“敦煌学”研究来讲，它也离不开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而敦煌壁画是极重要的实物资料，如失去了敦煌壁画，“敦煌学”研究中许许多多的学术问题也就无从弄清，所以我们要

进一步致力于“敦煌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就应更加重视与之休戚与共的敦

煌壁画的保护！

(本文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池田 温

加强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刍议

最先完成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敦煌汉文文献目录，是陈垣先生主编的《敦煌劫余录》6册，1931年出版。其后有翟理斯(L. Giles)所编的《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57年出版；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等所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册，1963、1969年出版(第3册以下未刊)；谢和耐(J. Gernet)与吴其昱所编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册，1970年出版；苏远鸣(M. Soyumié)等所编的同上目录第3册，1983年出版(第2、4册以下未刊)。而且，亦有综合目录如王重民所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出版。1986年又有台湾黄永武的改订增补本《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出版。此目配合《敦煌宝藏》而作，虽然目录记述比上述诸目简略，但是所收大部分项目可以参看图版，可谓现在最有用的目录。

50年代榎一雄先生积极指导摄制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带去的敦煌汉文文献6980件的显微胶片，打开了利用大量照片，系统地研究敦煌资料的途径。以后，60年代前后北京图书馆、80年代前后东京国立图书馆也相继摄制所藏敦煌写卷的显微胶片并公

开，为国际上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随时参考大部分敦煌文献照片的机会。黄永武所纂《敦煌宝藏》一共140巨册(1981—86年印行)，包含斯坦因本7599件及木刻20件，北京本8738件，伯希和本2000余件及台北中央图书馆本144件，列宁格勒本26件，美术品2134号，香港个人藏《太上玄元道德经》1件(尚有无关敦煌的斯坦因第3次中亚探险所得断片类197号和伯希和本放大欣赏篇150件)。黄氏新目虽小部分改善王氏《总目索引》，然而犹存不妥不备诸项颇多。我认为今后还要做如下的编目工作：

(1)加以分类排列。其间可参照兜木正亨氏《敦煌法华经目录》、大洲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王重民氏等《敦煌变文集》、周祖谟氏《唐五代韵书集存》、山本达郎氏等《敦煌吐鲁番文书》(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丛刊、陆宏基、唐耕耦两氏《敦煌社会经济资料真迹释录》等诸书之成果。

(2)推进缀合断卷。北京图书馆藏写经已经分类排列，比较容易接合诸卷，可以复原原卷。同时，集中整理原来属于一部的文献。

(3)汇辑内外诸机关或个人分藏

的写卷，并进行辨别真赝的工作。

北京图书馆内新设的敦煌吐鲁番学会资料中心，应担当推行这一事业

的重任。

（本文作者系日本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美国〕梅维恒

我与敦煌变文研究

1973年我开始对敦煌变文的起源和性质等问题发生兴趣，这门学问之所以吸引我，首先是因为变文乃是用一种汉语所写流传甚广的古代俗文学。由于研究佛学，这类变文的印度模式(Indian parallels)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一接触变文这门学问，便吃惊地发现尽管变文极其重要，但是几乎在有关变文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对于现存变文的数量、变文与敦煌所出的其它文学形式的关系以及变文本身的意义等等，学者们都大有歧见。我研究变文越多，便越认识到有关变文的许多争论都是由于有些学者不愿从中国以外去探寻必要的史源，并且错误地理解它们在宗教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使用早期通俗汉语创作的变文，今天读来颇感生涩，但总的说来还是可读和可以理解的。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卷子的质量不佳、书手文化程度不高、创作变文的唐代通俗汉语特点还不够稳定、不成熟等等，以致翻译变文很困难。在研究过程中，对我特别有用的工具书有两种。一是入矢义高的《敦煌变文集口语汇索引》（东

京，1961年编者自刊，1987年补编），二是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976年我完成了《伍子胥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张义潮变文》的译注，作为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1983年加以修订，以《敦煌俗文学》的书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此后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便是考证敦煌变文的作者。我有幸获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资助，访问了大量收藏敦煌写卷的单位（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和北京），得以仔细观察原件。我的发现记述在《世俗学者及其所创作的文学：敦煌写卷目录》中。（载《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论集》1981年，第10期）

1988年春天是我致力于研究变文的高峰，出版论著两种：《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哈佛—燕京学社专论，第28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委员会，1988年）、《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8年）。前者主要是详细探讨了变文及其有关体裁、变文的含义和形式

(特别是说唱性质)，考证了作者和讲唱者，论述唐代确有变文讲唱者存在。后者系在更广泛的视野内讨论变文，把变文视为带着图书讲故事的一种。书中考察了古代印度如何带着图画讲故事，又如何传入中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近现代印度带着图画讲故事的情况，还有日本、伊朗、埃及、

土耳其、欧洲及其它地区如何利用绘画讲述故事等等。

变文是通俗汉文创作的第一个范例，这种通俗汉文力图在古典文学占统治地位的王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知识挑战是令人鼓舞的，我将满腔热忱地迎接这一挑战。

(林世田译)

敦煌遗书知多少

敦煌遗书(包括非敦煌出土的)究竟有多少?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000余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000号未编目;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卷、藏文226卷,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卷。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谷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卷,其他人(包括一些不知姓名者)共有20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000余件汉文文书、南朝鲜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000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000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收藏。

(卢秀文)

“敦煌文学”

丛 说

这是一组环绕“敦煌文学”开展的笔谈，特点是各抒己见。此后，如有别的作者就此命笔，仍可继续下去。对这种新的尝试，您喜欢吗？

“敦煌文学”的内涵

周绍良

在敦煌学的研究中，汉文文献的研究开展最早，其中有关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更居前列，因而又演化出“敦煌文学”、“敦煌俗文学”等概念。但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至今尚缺乏统一的认识。

讲到“敦煌文学”，常提到的不外曲子词、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几类。其它方面的带文学性质的材料，则往往遭到忽视。实际上，如果深入全面地来研究敦煌汉文遗书，便会发现，以上几类作品不过是遗书中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要确定“敦煌文学”的内涵，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三种角度去考虑。

从它反映的地区性内容上来看，包括“边疆文学”和“中原文学”。边疆文学，指的是以反映敦煌等西部地区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

从实用范围看，可大别为“官府文学”和“寺庙文学”。

从性质上看，可大别为“传统文学”与“民间文学”。

以上三种分类，不见得都能把“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完全覆盖住。例如，“官府文学”和“寺庙文学”，仅是从应用性文书的角度区分。某些非应用性文学作品就不容易纳入。但是，把这三种概括性的分类综合运用，却可能从中看出“敦煌文学”的全貌。它们之间也并非毫不相关。具体说，“传统文学”是指士大夫阶层一向习用的文体，如古文暨骈文。特别是骈文，从六朝到唐代，是社会上通用的主要文体，不单

是中原文学，在边疆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也大量使用。像敦煌发现的一些书仪，有些可确指是敦煌人士的作品，可它们全是骈体文，与中原作品无殊。所以我们说，传统文学中包括了中原文学与边疆文学，而民间文学中又何尝不交叉着边疆文学与寺庙文学？寺庙文学指的是寺院中所用带宗教气息的疏文、讲经文之类，其中有从中原传去的，也有边疆地方编造的。以上三种类别是错综纠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的。综合来看，才能看到“敦煌文学”的完整构成。

我们使用的“中原文学”这个概念，在“敦煌文学”中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莫高窟所出一些写本，有些是从中原传过去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原作家所作现仅见于敦煌卷子中者（如《秦妇吟》）。这些当然都是中原文学，不过既经传入敦煌，必然哺育过敦煌地方文化，又靠了敦煌的特殊条件保存下来，所以我们把它列为“敦煌文学”之一项，而与边疆文学相对。一些尚在流传而亦见于敦煌藏经洞中的如《文选》之类的作品，我们则不将它列入敦煌文学项下。我们纳入的，只是一些由敦煌保存下来的中原文学佚文，以示与边疆文学之渊源关系。

根据上述观点，就能把“敦煌文学”的范围扩大。如果照《文选》的分类法，“敦煌文学”中都可找到它所列的各种体裁的踪影。试举例如下。

一、表、疏 如，作为边疆守臣对当时皇帝奏疏的《张义潮进表》，既显示边疆文学之作风，又仍然模仿着当时流行的骈体。

存于敦煌卷子里一些史籍中已经佚失的表章，属于中原文学范畴的，如封常清《谢死表》（伯3620），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都很为珍贵。

二、书、启 有颇具文学意味的，如《夫妻相别书》（伯3212背）。《李陵苏武书》托之苏、李，抒发个人感慨。文学不甚畅达，当是沙州边塞人之作品。

《宰相兼御使大夫张文彻上启》（斯5394）通篇以自然流畅的散文中述事由，在敦煌书启中不多见。

三、状 如《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

四、帖、牒 如《都僧统光然帖》（斯1604）采用白话散文，布告佛

门事宜，别具一格。

从中原流传至敦煌者，如《定州开元寺僧文牒》(斯0529)

五、书仪 在敦煌卷子中，书仪达二、三十种，有些是中原地区作者所作，有些是敦煌当地作者所作，两相比视，并无高下之分。

六、契约 如《放女从良文》(斯5700)既透露出一定的社会内容，又通过生动的文字风格，反映出立约人的性格。

七、传记 如《张议潮别传》(斯6973)，并有详注，可见本意即以文学作品对待之意。

八、题跋 有些题记，叙事清楚，文字简朴，有一定的文学或历史价值。

九、论说 如，《茶酒论》(斯0406、5775、伯2718、2875等号)《梵志喜学多术说》(斯1713)。

十、文、录 如《善惠雪山修道文》(斯3052)是比较流利的散文，颇近口语。再如《敦煌录》(斯5448)以文学笔法记述了敦煌地方的山川名胜。

十一、颂、箴 如《节度押牙建造兰若功德颂》(斯3929)。《亡名和尚绝学箴》(斯2165)疑是中原作品流传至敦煌地方者，无名和尚应即是《宋高僧传》中唐洛阳同德寺僧无名。

十二、碑、铭 如《常何墓碑》(伯2640)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淮深)府君墓志铭》(伯2913)。

十三、祭文

十四、赋、俗赋如《韩朋赋》(斯2653、斯2922)《晏子赋》(伯2564、斯5762)《燕子赋》(伯2491、斯0214、伯2653)等三数篇。也有传统文学作品。如刘霞《驾行温汤赋》(伯2976)史籍记载不全，幸为石室保存。

十五、诗

(甲)敦煌诗人之作 如，敦煌陷蕃人七十二首(伯2555)。(乙)释氏作品 如《王梵志诗集》。(丙)旅人、妇女作品 如伯3629卷尾，又如《康大娘遗诗》(斯5381)等。(丁)敦煌所保存唐代诗人作品 如韦庄《秦妇吟》(伯2700、斯0692等九写本)。

十六、偈、赞 《行香偈文》(斯6229)《佛母赞》(斯5581)等。

十七、邈真赞 《宋李存惠邈真赞》(斯0289)

十八、歌谣 《沙州图经》(伯2005)中载有十首左右。连续抄录，未分段落，也有人认为是一首长歌，似未必是。

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曲子词、佛曲、民间曲词、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押座文、解座文、小说、话本、诗话、词文等十几项，因例证常见习知，就不一一列举了。

俗赋、词文、通俗小说

程毅中

1. 俗赋 敦煌文学中有俗赋一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来源于先秦两汉的赋。从总体上看，大致有四个特点：一、基本上是叙事文学；二、大量地运用问答对话；三、往往带有诙谐嘲戏的成分；四、部分是散文体，句式参差不齐，押韵不太严格。

这些特点在先秦两汉的赋里就已具备，例如宋玉的《对楚王问》、《高唐赋》以至曹植的《髡髻说》、《鹞雀赋》等。敦煌俗赋发展了这些特点，成为一种叙事体的俗文学，如《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等。

《晏子赋》叙晏子与梁王辩论的故事，取材于《晏子春秋》，有很深远的渊源。但赋中有不少情节出于后人的铺演增饰。如把晏子使楚改成使梁，把关于小的辩论扩展到辩短、辩黑和天地阴阳的问难，把晏子不入狗门改为不耻入狗门。这些铺叙保持了辞赋的传统，而它的构思和设想又近似民间文学。赋假托晏子和梁王的对话，一问一答，针锋相对，颇见机智，又带有嘲弄的意味。从文体看，大体上是散文，只有少数几段句子比较整齐，也有韵脚。如晏子对梁王问黑的一段：

梁王曰：“不道卿短小，何以黑色？”晏子对王曰：“黑者，天地之性也。黑羊之肉，岂可不食？黑牛驾车，岂可无力？黑狗趁兔，岂可不得？黑鸡长鸣，岂可无则？鸿鹤虽白，长在野田；丧车虽白，恒载死人。漆虽黑向其前，墨挺虽黑在王边。采桑樵黑者先尝。方知此言见大〔白〕何益！”

《晏子赋》的体裁和古赋相差不远，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还可以从《天问》《招魂》找到根源。

《韩朋赋》叙宋王夺取韩朋妻贞夫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见于《列异传》、《搜神记》，是很有名的。宋王强迫贞夫入宫为后，贞夫坚决不从：

辞家别亲，出事韩朋。生死有处，贵贱有殊。芦苇有地，荆棘有丛，豺狼有伴，雉兔有双。鱼鳖有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之妇。

这段对话就是辞赋的语言，比喻迭出不穷，而又长于说理。最后韩朋自杀，贞夫从清陵台上跳下身亡，二人化为青白二石。宋王把他们分葬路的东西，结果两边长出树来，根叶相连。宋王又伐树，两块木片落水，变成鸳鸯飞走，落下一片羽毛，宋王拿羽毛在脖子上一抹，头就掉下了。这个结尾富有民间故事的斗争精神。

《燕子赋》写黄雀强占了燕子的巢，还打伤了燕子。燕子告到凤凰处，凤凰对雀儿判了刑。最后燕雀两家又讲和了。这篇赋情节很丰富，语言生动活泼，非常风趣，在艺术上是很成熟的。赋基本上是四言、六言句式，韵脚较密，比较工整。另一篇《燕子赋》故事情节大致相同，但全篇是五言句。这种赋体也是早有先例的。唐以前就有刘谧之的《庞郎赋》、刘思真的《丑妇赋》，也都是五言句。敦煌写卷里也有一篇赵洽的《丑妇赋》，故事性较差，诙谐性则很强。还有一篇《𪚩𪚩书》，与《丑妇赋》有相似之处，写的是一个悍妇，是话本《快嘴李翠莲记》的先驱。

赋体作品还有《孔子项托相问书》、《茶酒论》等。《相问书》讲小儿项托问倒了孔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故事，直到清末还在流传。敦煌叙事文学有不少作品可以看作赋的各种变体，但不一定用赋的名称。这种俗赋对于变文、讲经文系列的说唱文学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2. 词文 词文是只唱不说、全部用七言句组成的唱本。敦煌写卷里只有一篇《季布骂阵词文》，给我们提供了标本。它原有题目是“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拔马收军词文”，又称“捉季布传

文”。这篇词文用唱词叙述故事，体制独特，显然与变文有别。结尾两句：“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唱词文的应称作“词人”。明代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十六回里有“诗句歌来前辈事，词文唱出古人情”的话，说明后世的词话还可以称作词文。《季布骂阵词文》就是早期的词话。

词文所讲季布故事，出于《史记》的《季布栾布列传》。季布本是项羽部将，曾屡次打得刘邦走投无路。刘邦灭项后就悬赏千金通缉季布，季布先藏在周氏家里，周氏又把他卖给当时大侠朱家（词文作朱解）为奴。朱家替他找滕公夏侯婴去说情，劝刘邦赦免了季布。词文据史书敷衍，加上许多虚构的情节。如说季布在阵前辱骂汉王，刘邦感到羞耻而退避，汉军阵脚大乱，因此汉王记仇，要严惩季布。季布被卖到朱家后，显示他文武双全，才能出众。朱家托夏侯婴说情，又添出一个萧何，托词东齐百姓因搜寻季布，连田也荒了，请皇帝撤销追捕季布的命令，最后又骗说皇帝下诏召请季布出来任官。由此可以看出唐五代时的词人很善于铺叙故事，能把史书上一个简单事件演成一篇640句、4400多字的长篇叙事诗，通篇押真、文韵，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结构如此宏伟，情节如此丰富，历史又如此久远，后世词话、弹词、宝卷系列的发展，是有深厚基础的。

写卷中还有一篇唱董永故事的，全篇纯为七言唱词，和《季布骂阵词文》体制完全相同。讲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董永遇仙女故事。词文中比较新奇的情节是董永和仙女所生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时要去寻找母亲，有孙宾指点他到哪里去找。词文说：

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

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

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

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羞见小儿郎。

这个情节结构在民间传说里十分常见。敦煌本《搜神记》中有一个田章寻母的故事，与此相似，可是孙宾却换成董仲了。

3. 通俗小说 敦煌俗文学里有一类是以散叙为主的通俗小说，实